BIBLID 0253-2875(2005)24：3 pp.1-12

大陸近百年梁啟超研究綜述

A Summary of Recent Scholarship in Mainland China on Liang Qichao

侯杰（Hou Jie）* 李釗（Li Zhao）**

梁啓超（1873-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梁啓超是在「三千年未有之變」的近代中國出現的一位文化巨人，他以巨大的個人聲望和激盪人心的文筆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在政壇上，他曾爲民族的自強而抗爭，對近代中國的政治走向、經濟形態都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在學術上，他的著述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歷史等諸多方面。而他在新聞報業、教育、圖書等眾多方面也都是開風氣之先的拓荒者。在他的身上，交織著政治家、學者、社會活動家等多重社會角色。

大陸近百年來對梁啓超的研究幾乎不曾間斷，據不完全統計，已經出版的有關梁啓超的書籍360多部，論文1,200多篇，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對梁啓超的研究更是取得傲人的成績。這些著述讓我們從眾多方面、不同角度認識了梁啓超的政治思想、國家民族思想、文學思想、史學思想、哲學思想、法學思想、經濟學思想、社會倫理觀、宗教觀、中西文化觀、性別觀念，乃至他在近代教育、圖書館事業、檔案學、翻譯學、目錄學上的貢獻。

我們透過對大陸近百年來有關梁啓超的論著和文章的整理爬梳，試圖描繪出有序的主線並加以評論，爲海內外學者研究提供某些便利與啓示。

一、1949年之前的梁啟超研究

對於梁啓超的研究，在他生前便已開始。除了一些散見的詩話式評點之外，主要的工作便是出版、翻印梁啓超的著述。當時出版的書籍有兩類，一類是梁啓超所撰寫的專題性書籍，如黃梨洲原著，飲冰室主人節鈔《節本明儒學案》（上海：上海新民社，1905年）、《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22年）。另一類是他所撰寫書籍的合集，如《飲冰室文集》（上海：廣智書局，1905年及北京：中華書局，1916年）梁啓超著作的結集，最初是1902年何擎一（天柱）編、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的《飲冰室文集》，到1937年陳筱梅編、上海仿古書店出版的《飲冰室文集全編》爲止，前後35年間，大約有40種不同版本的文集問世。其中，1932年林志鈞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合集》（1936、1940重版），分專集（專書）、文集（論文）兩部分。梁氏一生重要的論著幾乎都被收入此合集中，因而該書收錄最富，篇幅最大，體例較妥，校訂也很仔細，是現存梁啓超集中比較好的文集，成爲後來研究梁啓超的基礎性資料。此外還有各種專集（如政論集、講演集、文鈔、詩鈔等）20多種，單行本100多種。這個時期梁氏的許多著作再版，有些著作在再版後又補充了新內容，說明了其著作深受歡迎，也可以看出梁的著作對時人所產生的影響。1929年以前，我們僅找到兩篇文章：張星烺〈梁任西曆史研究法糾繆〉（《地學雜誌》1923年第1、2期）和超麟〈梁啓超怎樣瞭解中國的階級鬥爭〉（《中國青年》1925年第79期）。

從1929年梁啓超逝世至1949年的時間裏，著作方面仍多是梁啓超著作的再版，但數量有所增加。如梁啓

* 作者爲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 作者爲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研究助理。

超著、王雲五主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30 年）以及《歐遊心影錄節錄》（北京：中華書局，1936 年）、《新大陸遊記節錄》（北京：中華書局，1936 年）等 20 餘部。此外，還有一些以梁啓超爲研究對象的論著出版，包括吳澤撰寫的《康有爲與梁啓超》（上海：華夏書店，1948 年）和吳其昌編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叢書類編中的《學術先進：梁啓超》（重慶：重慶出版社，1944 年）。其中，比較重要的是楊復禮編著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鄭州：新河南日報社，1941 年鉛印本）。[1]

在這一時期，以悼念梁啓超、回憶其生平遺事和概論其一生的文章較引人注目：張其昀〈悼梁任公先生〉（《史學雜誌》1929 年第 5 期）、吳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中央周刊》1943 年第 21 期）。[2] 這些梁啓超舊交所作的憶念文章，雖然在對梁啓超評價中因突出了感情因素而稍顯理性研究不足，但爲後來梁啓超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另外，還有評析梁啓超政治思想、學術觀點的論文：胡繩〈梁啓超及其保皇黨思想——一個保皇自由主義者的臉譜〉（《讀書與出版》1948 年第 3、4 期）、劉熊祥〈梁任公政治思想的概觀〉（《治史雜誌》1939 年第 2 期）、素癡〈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報・文學副刊》1929 年 2 月 11 日）、吳雁南〈梁啓超的維新觀與新學〉（《近代史研究》1939 年第 3 期）等。

梁啓超的魅力不僅影響了同時代的人，也影響著後人。吳其昌是梁啓超的弟子，他對梁啓超在文學界的貢獻有較高的評價，認爲「文體的改革，是梁啓超最偉大的功績」，有了「雜以俚語的新文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3] 王森然對梁啓超在新聞輿論方面的成就也給予稱讚，「清末士氣之奮發，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傳，實與有利焉」。[4]

國學大師胡適對梁啓超始終存有感激之情，他在《四十自述》中追憶說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從那時他便埋下了其「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他給予梁氏很高評價，「梁任公爲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5] 郭沫若一度對梁的文筆也十分著魔，他在《少年時代》中寫道「《清議報》……雖然言論很淺薄，但他卻表現得很有一種新的氣象……他以輕靈的筆調描寫那亡命的志士、建國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爲一個革命家的代表……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毛澤東曾經也是梁啓超的崇拜者，青少年時代深受梁的影響，毛曾學梁的「任公」筆名取名「子任」；1918 年，毛澤東組織的學生社團名曰「新民學會」擬自梁啓超所辦的《新民叢報》。

二、1949-1978 年的梁啟超研究

在 1949 年至 1978 年，出版有關梁啓超的書籍 7 部，其中翻印梁啓超著述 5 部：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梁啓超著、康有爲評《梁任公詩稿手迹》（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梁啓超著、舒無點校《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和《國性與民德——梁啓超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75 年）。另外 2 部是研究梁啓超的著作：韓安荊編著《梁啓超研究資料彙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62 年油印本）和牛仰山《梁啓超》（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1 此前有《康梁年譜稿》（3 冊），1938 年油印本。
2 此外，尚見於張其昀，〈梁任公別錄〉（附張蔭麟跋），《思想與時代》1941 年第 4 期、鄭振鐸，〈梁任公先生〉，《小說月報》1929 年第 2 期、趙豐田，〈維新人物——梁啓超〉，《大公報・史地周刊》1936 年 10 月 23 日。
3 吳其昌，《梁啓超》（重慶：重慶出版社，1944 年）。
4 王森然，〈梁任公評傳〉，《中國公論》第 9 卷 5 期。
5 胡適，《四十自述》（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33 年）。

論文方面數量最多的是對梁啓超思想體系的探討，特別是在 60 年代以《文匯報》、《光明日報》爲中心對其思想的階級性，尤其是晚年思想展開了熱烈討論。[6] 復旦大學歷史系舉辦了「梁啓超思想評價問題」的討論會，[7] 很多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就梁啓超的階級性質問題發表了各自的見解，尤其對他的「流質易變」歧見紛紜。蔡尚思曾就梁啓超各時期的階級屬性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8] 認爲梁啓超前期是一個「不大像樣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後期則「退回到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去，竟和資產階級思想衝突起來」。[9] 有些論說由於受到政治上「左」的思潮影響顯得比較激進，80 年代以後，蔡尚思對某些話語進行重新闡釋。[10] 夏東元則認爲「梁啓超始終基本上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政治活動都是以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爲基礎的。[11] 曹亨聞也提出「在前期他曾不失爲世界有名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出色的改良主義政論家之一」。[12] 還有學者持比較調和的觀點，認爲梁啓超身上有一個不變的實質，「那就是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體系」，「因爲梁啓超是一個由地主階級向資產階級轉換的人，也必然保留著濃厚的封建階級色彩。」[13]

此外，較多研究者關注梁啓超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動。探討梁啓超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活動有：戊戌時期，吳相湘〈翁同龢康有爲關係考實——梁啓超「戊戌政變記」考訂〉（《學術季刊》1955 年第 2 期）、胡濱〈戊戌變法時梁啓超的思想〉（《光明日報》1956 年 3 月 1 日）、侯外廬〈「戊戌變法」前夕梁啓超的折衷主義政論〉（載於侯氏主編《戊戌變法六十周年紀念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年）。[14] 辛亥革命時期，陳旭麓〈辛亥革命前梁啓超的思想〉（註 13）、陳旭麓〈辛亥革命後梁啓超的思想〉（《文匯報》1961 年 7 月 25 日）。民國時期，吳澤〈梁啓超的「擁袁」與「倒袁」運動〉（《中國建設》1949 年第 4 期）、李龍牧〈梁啓超前期新文化運動〉（《文匯報》1961 年 6 月 27 日）、惠隱〈梁啓超任北洋財政總長時二三事〉（《廣東文史資料》1963 年第 8 期）。[15]

有關梁啓超在史學、哲學和教育事業等方面的論述雖不多，但足以表明研究範圍已有所擴大。如胡濱〈論梁啓超的史學〉（《文史哲》1957 年第 4 期）、孟祥才〈梁啓超哲學思想初探〉（《山東師院學報》1976 年第 1 期）、欒調甫〈讀梁任公〈墨經校釋〉〉（載於

6 《文匯報》邀請史學界人士討論「梁啓超思想體系的階級性」，座談會上的意見可以歸納爲三種：不少人認爲他一生不分前後期，一直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只有時代的變遷，而沒有本身思想的變化；有些人認爲他一生都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也有人認爲他後期是地主階級的改良主義者，還沒有到地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程度。這三種觀點大致反映了學界對梁啓超的階級性分歧在於是地主或是資產階級（〈本報邀請史學界部分人士座談討論梁啓超思想體系的階級性〉，《文匯報》1961 年 4 月 7 日）。

7 黃保萬、董力生，〈復旦大學歷史系討論梁啓超思想評價問題〉，《文匯報》1961 年 6 月 13 日、〈關於梁啓超後期思想體系問題〉，《光明日報》1961 年 4 月 6 日。

8 蔡尚思，〈梁啓超後期的思想體系問題〉，《文匯報》1961 年 3 月 31 日、蔡尚思，〈梁啓超在政治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論梁啓超後期的思想體系問題〉，《學術月刊》1961 年第 6 期、蔡尚思，〈三論梁啓超的舊傳統思想體系〉，《光明日報》1961 年 9 月 25 日、蔡尚思，〈四論梁啓超後期的思想體系——讀陳旭麓同志的〈辛亥革命後的梁啓超思想〉〉，《學術月刊》1961 年第 12 期 。

9 蔡尚思，〈梁啓超後期的思想體系問題〉，《文匯報》1961 年 3 月 31 日。

10 蔡尚思，〈梁啓超的總評價——梁啓超由創造歷史紀錄的一面〉，《解放日報》1988 年 9 月 18 日。

11 夏東元，〈梁啓超後期的主導思想仍然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文匯報》1961 年 4 月 28 日。

12 曹亨聞，〈我對梁啓超後期思想的看法〉，《文匯報》1961 年 5 月 5 日。

13 陳旭麓，〈辛亥革命前梁啓超的思想〉，《光明日報》1961 年 7 月 5 日。

14 此外，吳相湘，〈翁同龢康有爲關係考實——梁啓超「戊戌政變記」考訂〉（下），《學術季刊》1956 年第 3 期、胡濱，〈戊戌政變至辛亥革命期間的梁啓超〉，《新建設》1957 年第 4 期。

15 吳澤，〈民元後康梁的再反動：復辟與護法〉，《中國建設》1949 年第 5 期、李宗黃，〈梁啓超如何利用雲南起義？〉，《中外雜誌》1969 年第 6 期。

《墨子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6 月版）、趙乃傳〈梁啓超的教育思想〉（《華東師大學報》1958 年第 1 期）。

還有一些文章概述性地介紹了梁啓超的生平，周善培〈談梁任公〉（《文史資料選輯》1960 年第 3 期）、任木〈梁啓超故鄉述聞〉（《廣東文史資料》1964 年第 3 期）。[16]

在這些文章中，對梁啓超一生的分期問題討論較多，主要有三種觀點。單從梁啓超的主導思想來劃分，他的一生可分成兩大時期：大約在 1915 年《新青年》問世、新文化運動與東西文化問題大爭論前爲第一時期，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此後則爲第二時期，倒退爲地主階級復古主義者。[17] 有的將其分爲前、中、後三個時期：前期大約在 1905 年同盟會成立以前，主要是以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立場去反對地主階級頑固派，具有進步性；中期大約從 1905 年到 1919 年五四運動前，由中立到落後乃至反動，然而在一定程度上還帶有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本色；後期是從五四運動後直到他逝世，具有兩面性，但地主階級思想已經發展成爲主要的一面，把共產主義和人民的革命鬥爭作爲反對的主要物件。[18] 此外，有文章根據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和梁啓超政治思想演變的特點，將梁啓超政治思想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學康有爲到戊戌政變（1890-1898）；第二階段，從逃往日本到與革命派論戰（1898-1905）；第三階段，從論戰失敗到辛亥革命（1906-1911）；第四階段，從辛亥革命後回國到去世（1912-1929）。[19] 有關分期問題，學界討論得頗爲熱烈，很多文章都競相以先進——落後爲標準闡明觀點。這本身就是時代的產物，之前沒有，之後也慢慢被淡化了。

關於梁啓超在戊戌維新時期的歷史作用，學者們一致認爲他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功績是應該予以肯定的，其變法圖存的主張確實難能可貴。但是由於堅持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立場，所以他和清朝封建統治勢力妥協，造成了他思想上的缺陷。有學者認爲，梁啓超所主張的民權「對封建專制雖有所抱怨，實際上還是希望通過與封建專制的妥協而發展起所代表階級的利益」，「敵視和害怕人民群眾的態度，是梁啓超一方面讚美西方的『民主』或『民權』，而內心卻是害怕的。」[20] 有學者認爲梁啓超「主張『君民同治』，要保持君主制度，是荒謬地肯定中國當前還不能夠立即設立議院」，「當時中國只能走英、日等國的道路，建立具有君主的資產階級『民權』國家，而不能走美、法等國的道路，建立取消君主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21]

對於梁啓超在民國初年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梁啓超的擁袁與反袁，二是梁啓超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尊孔傾向。

在擁袁的問題上，學者們認爲，梁啓超是「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但他除了充當袁世凱的俘虜外毫無政績。[22] 這使梁啓超在政治上更進一步的墮落：在新的形勢下，不能不依託於大地主大買辦的代表袁世凱，而逐漸成爲地主買辦集團的骨幹。[23] 倒袁問題上，學者們多傾向於同意「梁啓超的積極地搶奪倒袁運動的旗幟，與其說是在反對帝制，還不如說是爲了抑制革命。」[24]

尊孔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政治話語的突出表現，在此前後這個話題基本上是不談的。有學者認爲梁啓超後

16 戴君仁，《梁啓超》，《中國文學史論集》第 4 冊，1958 年版、馮友蘭〈梁啓超的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陳匡時，〈關於對梁啓超的評價問題簡介〉，《學術月刊》1960 年第 2 期。

17 蔡尚思，〈梁啓超在政治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論梁啓超後期的思想體系問題〉，《學術月刊》1961 年 6 月。

18 同上註。

19 王介平，〈論改良主義者梁啓超〉，《教學與研究》1956 年第 12 期。

20 金沖及、陳匡時，〈論梁啓超〉，載於《中國近代人物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65 年）。

21 胡濱，〈戊戌變法時梁啓超的思想〉，《光明日報》1956 年 3 月 1 日。

22 陳旭麓，〈辛亥革命後梁啓超的思想〉，《文匯報》1961 年 7 月 25 日。

23 王介平，〈論改良主義者梁啓超〉，《教學與研究》1956 年第 12 期。

24 同註 22。

期的思想特徵即爲「一直緊抱住著儒家孔子的破爛武器來反共反蘇反人民反革命」，[25]「他妄圖在高等學校中親自培養出一批具有封建傳統思想的尊孔派，去做反進步反革命的工作」。[26]但也有學者比較客觀地考察梁啓超關於尊孔文章原典的論說，認爲「梁的尊孔，雖有其封建性的一面，卻總還是說不上是『堅決捍衛封建文化、努力宣傳封建道德』[27]的」，「而且這裏是指的個人主義的教育」。[28]

有關梁啓超的小說理論方面的研討，由於受時代學術風氣的影響，多持否定的態度。有人探究的是「梁啓超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在中國革命的發展過程中，如何由進步走向反動」，[29]只有少數人主張，對梁氏的「小說界革命」成功和失敗不應狹隘的以是否實現君主立憲政治爲尺度，[30]但這種觀點一經出現馬上遭到了反對，認爲「小說界革命的號召提出後，確曾推動了當時小說的改良運動，促成了小說界一度繁榮的局面，但是由於號召本身有著很大程度的軟弱性和不徹底性……很快就爲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擊敗，而銷聲匿跡了」。[31]

該時期的文論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特點，一些文章在對人物進行闡釋時可能要先分析人物的先進性，但無論梁啓超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有多大，都要強調其局限性，並且將其歸結爲階級屬性；還有一些文章本身就是以批判梁啓超爲基調的，一般先會確定其階級成分，然後再分析他在各個時期的活動及言論。另外一個特點是，有些文章在分析梁啓超時都要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語句，作爲觀點的支撐和補充，由此打上了時代主流政治話語的烙印。

我們可以從字裏行間看出，當時頗具「爭辯性」的學術風氣，駁論的文章頗佔一定比例。很多觀點後來長時間佔據大陸史學界的主流，寫在教科書中，現在成爲我們「再商榷」的對象。但在當時他們的觀點也是挑戰舊的史學規範，有些見解還比較深刻，從這個角度來說其無疑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學術意義。

在這一時期，儘管學者們對梁啓超褒貶不一，但大致走過了這樣的路線。1949 年後，對梁啓超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尤其是在 1958 年紀念「戊戌變法六十周年」的時候，形成了梁啓超研究史上的一個小高潮，並且一直持續到 1966 年。之後梁啓超研究則漸漸沈寂下來。60 年代後期由於受「厚今薄古」、「古爲今用」等政治話語的影響，梁啓超研究也進入低潮。加之確立了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史觀，梁啓超的研究在受到歷史檢驗的同時也受到政治主流話語的左右。

三、1978 年以來的梁啟超研究

1978 年後，大陸學術界思想空前活躍，學術著作林林總總，給人以新桃換舊符的感覺。歷史科學無論在研究廣度和深度上都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總體上講，歷史研究形成了統一性與多樣性融合的特點：自然科學方法被引入歷史研究之中；外國史學理論的傳入對中國近現代史學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些新資料的發現，豐富和補充了以前的研究，甚至修正了以往的某些結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文化環境中，一大批關於梁啓超研究的作品應運而生，不僅論文數量大量增加，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得到極大的加深、拓寬。

1978 年至今，梁啓超研究進入了發展和繁榮的階段。據不完全統計，僅梁啓超原著再版的書籍就有近 70 版次之多。再版的書籍幾乎囊括了梁啓超生前的全部著述，並且還在搜集佚散的梁啓超手稿。這個時期出現了資料性著作大量刊行，研究性著作不斷問世等發展

25 蔡尚思，〈四論梁啓超後期的思想體系——讀陳旭麓同志的〈辛亥革命後的梁啓超思想〉〉，《學術月刊》1961 年 12 月。
26 蔡尚思，〈三論梁啓超的舊傳統思想體系〉，《光明日報》1961 年 9 月 15 日。
27 胡繩武、金沖及，〈關於梁啓超的評價問題〉1960 年第 2 期。
28 李龍牧，〈梁啓超前期新文化運動〉，《文匯報》1961 年 6 月 27 日。
29 佘樹森，〈如何在文學上評價梁啓超〉，《光明日報》1960 年 9 月 25 日。
30 朱眉叔，〈梁啓超與小說界革命〉，《文學遺產增刊》第 9 輯（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31 王立興，〈梁啓超的小說理論與「小說界革命」〉，《南京大學學報》1963 年第 3-4 期。

態勢。

（一）資料性的著作

在資料性著作中有的是梁啓超的著作原版翻印，有的是學者編選的梁啓超著作的出版。《飲冰室合集》一直是梁啓超研究中的重要資料，1989 年後中華書局重印了 3 次。梁啓超許多著作的單行本也大量刊印，比如《梁啓超史學論著四種》，嶽麓書社於 1985 和 1998 年 2 次重印。這樣的著作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

學者編選的梁著也是多不勝數。方志欽、劉斯奮的《梁啓超詩文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 年），選錄的原則是：著重選取政治性的，其次是學術性的，再次是詩詞；選其中最有影響者，兼顧了不同題材、不同年代、不同篇幅的著作。李華興、吳嘉勳的《梁啓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選取了梁的譯述、函電、遊記、書序等，共 120 篇，其中未收入《飲冰室合集》者 25 篇，未刊稿或信件 13 篇，以政論爲主，兼及學術論著，著重反映梁的政治思想。夏曉虹的《梁啓超文選》（上、下）（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年），分爲 11 類，即時論、雜談、宗教、歷史、治學、人生等篇。

中華書局編的《梁啓超未刊書信手迹》（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和張品興編的《梁啓超家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年），可以說是梁氏的書信、家書的結集出版，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另外有一部研究梁啓超的基礎資料性扛鼎之作是丁文江、趙豐田編撰的《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該書的基礎是 20 世紀 20 年代丁文江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未刊油印稿），經趙豐田補充後印行。該書引證豐富、觀點鮮明、考證賅洽、資料翔實，是一部力求真實評價梁啓超的年譜，填補了梁啓超研究資料方面的一個重要空白，爲後人解讀梁啓超提供了翔實重要的史料。另外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也已經出版（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

這些資料性書籍的大量出版，說明了學者們重視梁啓超研究中的基礎性工作，體現了學者對研究梁啓超資料的需求，既標誌了梁啓超研究在這個時期是不斷步入繁盛，也進一步推動了梁啓超研究的繁榮發展。據悉湯志鈞、張磊等人主編的《梁啓超全集》正在編纂之中，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二）研究性的著作

諸多的研究性書籍以梁啓超傳記居多，前前後後出版了 20 部左右。這些傳記既各有側重，又相互聯屬，時出卓見，多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文學魅力。孟祥才的《梁啓超傳》[32]，是 1949 年以後出版的第一部梁啓超詳傳。「這本書以時代爲軸線，在佔有豐富資料的基礎上，全面敘論梁氏一生的政治、學術活動，力圖以梁氏這一人物反映中國近代史的曲折歷程。」[33] 作者認爲「梁啓超之所以成爲一個把偉大和渺小、光榮與恥辱結合一身的歷史人物，就是因爲他的思想和行動沒有一直反映歷史的要求。」該書在當時「革命」話語佔主流的時期，難免有一些不足，某些觀點引起異議，但在那個時代出版這樣的一本傳記已實屬不易，所以該書的出版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對今後的學者撰寫梁啓超傳記提供了較多的借鑒。

李喜所、元青的《梁啓超傳》[34] 是一部學術性較強的傳記作品。作者著力處理好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寓評論於敘史之中，以梁的政治活動爲緯，學術文化分段插入；第二，突出梁的個性，對其個性、形象、發展、回歸、昇華過程著墨較多，家庭生活、業餘愛好、交友出遊、情感起伏、思維方式也加以評述；第三，敘述了梁的學術文化觀點和貢獻。有學者稱頌該書是「對梁啓超研究做了集大成式的總結」。[35] 該書連續印刷了三次，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此外有三本是關於梁啓超家族的著作：羅檢秋《新會梁氏：梁啓超家族的文化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32 孟祥才，《梁啓超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年）。

33 林言椒、李喜所，《中國近代人物研究資訊》（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年），頁 227。

34 李喜所、元青，《梁啓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35 周佳圓，〈頗具新意的《梁啓超傳》〉，《歷史教學》1995 年第 8 期。

出版社，1999 年）、吳荔明《梁啓超和他的兒女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和李喜所、胡志剛《百年家族：梁啓超，梁思成，梁從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三書各有千秋，皆致力於對這個近代文化世家的揭示。

梁啓超的專題研究著作涉及思想、政治、學術、文化、文學、教育、法律等眾多領域，如劉振嵐等《梁啓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1990 年）、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啓超的文學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潘強恩等《被歷史「遺忘的角落」：梁啓超的新民學說與經濟思想》（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年）、楊曉明《梁啓超文論的現代性闡釋》（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董方奎從梁啓超與清末政體變革的關係，具體闡述了近代志士仁人追求民主憲政的歷史，探討了近代中國民主進程與國情的關係，注意到當時的中國缺乏建立資產階級議會制君主立憲及民主共和國的條件，認爲「漸進論、主張通過開明專制或建立初級的君主立憲政體並反對在中國推行美國式共和政體，都有著可靠的根據和先見之明」。[36] 易新鼎系統地考察並評價了梁啓超對先秦諸子的比較研究、兩漢至宋明儒學思想衍變的分析、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總結，以及佛教史略及佛教和中國文化的關係的研究和貢獻。[37] 蔣廣學則展示了梁「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等中國學術觀的主體風貌，認爲這種過渡形態的學術觀，代表著中國從中世紀走向近代轉型期的文化形態。該書還對傳統的一些觀點提出挑戰，比如關於梁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作者認爲梁並不是社會主義的敵人，相反他認定 20 世紀的中國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好實驗場。[38]

在一些通史和專題史的著作中也有對梁啓超進行研究和探討的，如：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政治性話語逐漸減少，而學術性漸強，由過去否定的多到基本上肯定的多，同時研究的領域不斷擴大，研究也越來越細化。

（三）論文

從 1978 年以來，有關梁啓超的研究論文數量龐大、涵蓋面廣，在不同的領域具有開拓性意義。該時期的作品不乏觀點新穎、主旨明確的論文。其中「梁啓超的政治思想及其活動」、「梁啓超的文化思想」、「梁啓超的學術建樹」等方面是學者們研究較多的。更爲可喜的是學者們在美學、法學、詞學、檔案學、方志學、人口學、心理學、人生哲學、中西文化觀、城市觀念、音樂文化、圖書館事業方面提出一些具有開拓性的創見，深化了梁啓超研究。

在梁啓超總體性評價的論文中，有對梁啓超思想特點的研究、梁氏家族研究和對於梁啓超全集或年譜的研究，如陳旭麓〈論梁啓超的思想〉（收入陳氏《近代史思辨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 年）、李華興〈梁啓超與中國近代化〉（《歷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黃敏蘭〈中國知識分子第一人——梁啓超〉（《人文雜誌》1999 年第 1 期）、陳占標整理〈梁啓超家庭出身的調查材料〉(《文教資料》1988 年 4 期)、梁啓勳〈戊戌前後康梁史料補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資料文庫》第 1 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年）等。

在梁啓超政治思想及其活動的文章中，主要研究梁氏的總體國家政治思想和各時期的政治思想活動，如熊月之〈論戊戌時期梁啓超的民權思想——兼論梁啓超與康有爲的歧異〉（《蘇州大學學報》1984 年第 3 期）、林家有〈論梁啓超由擁袁到反袁思想的演變〉（《文史哲》1994 年第 4 期）、桑兵〈保皇會的宗旨歧變與組織離合〉（《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程　、薑繼爲〈知識分子參政模式的重塑——梁啓超對民初知識分子參政影響管窺〉（《安徽史學》2003 年第 1 期）等。

有關梁啓超的思想文化研究成果卓著，像周行易〈論梁啓超對我國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貢獻〉（《學術

36 董方奎，《梁啓超與立憲政治》（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年）。
37 易新鼎，《博學多變的人生：梁啓超的讀書生活》（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1999 年）。
38 蔣廣學，《梁啓超和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研究》1988年第1期）、張光芒、劉迎秋〈在「偉大」與「鄙俗」之間——論民初時期梁啓超的文化心態〉（《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張昭君〈儒學與梁啓超文化思想的演進〉（《安徽史學》2001年第1期）、馮天瑜〈梁啓超對近世中國「文化重演」現象的詮釋〉（《學術月刊》1996年第5期）、蔣廣學〈論梁啓超對中國文化向現代發展的探討〉（《東方論壇》1996年第3期）、焦潤明〈論梁啓超的文化選擇觀〉（《遼寧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元青〈梁啓超歐遊歸來後的文化思想傾向芻議〉（《中州學刊》1993年第3期）、劉福祥〈梁啓超中西文化觀的演變〉（《東嶽論叢》1990年第2期）。

梁啓超對學術貢獻諸多，也成爲研究的重點。包括梁啓超的文化觀和對不同學科的貢獻：陳其泰、安靜波〈20世紀初梁啓超對中國學術思想演進的宏觀考察〉（《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夏曉虹〈但開風氣不爲師：論梁啓超的文學史地位〉（《文藝研究》1990年第3期）、鄭師渠〈梁啓超與今文經學〉（《中州學刊》1994年第4期）、易樹人〈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梁啓超新文體的語言特色〉（《江漢論壇》1993年第10期）、李喜所〈梁啓超與近代史學〉（《歷史教學》1999年第7期）、郭劍波〈論梁啓超關於女子教育的思想和實踐〉（《浙江師大學報》1997年第5期）。

由於篇幅所限，在此只就一些代表性文章的觀點略加評述。

1．梁啓超的政治思想及其活動。這方面的探討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對戊戌變法前後梁啓超「興民權」的探討。有學者認爲，梁啓超用民權思想否定封建專制制度，抨擊君權至尊，主張「以群術治群」實現「人人有自主之權」。這些爲中國社會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種子，從而在真正意義上開始了中國近代化的過程。[39]但有學者不同意此說，認爲梁啓超的民權思想是充滿矛盾的：一方面擔心不興民權便無以服眾，另一方爲了防止革命又把興民權巧妙地轉化爲興民智，其目的是爲了防止和限制人民革命。[40]另外有學者認爲，「梁啓超把興民權和開民智聯繫起來思考，觸及到了影響政治制度變革的更深層的因素——國民的文化素質」，「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從本原上對作爲歷史主體的人的近代化做了深層思考。由熱衷於政體轉型到注重國民文化心理結構的重建，這是梁啓超近代化思想的昇華。」[41]

其二是有關民國時期梁啓超善變的政治思想問題。有學者認爲，梁啓超倡導革命言論，並不是爲了騙取孫中山等革命派的信任，而是自身認識深刻變化的結果，是完全真實和可靠的。梁啓超一生的思想從未脫離過「救亡圖存」這一時代主題，愛國之心、立憲之志和新民思想是他一生思想發展中不變的三個因素。[42]有學者則認爲，梁啓超在20世紀初鼓吹革命，固然有順應大勢的理智色彩，但更多是因客觀外界刺激而情緒性衝動的表現，不能看成是其思想的本質。他鼓吹革命主要是爲了迎合當時知識界對清王朝的憤怒情緒，以免遭致輿論界的反對。[43]也有學者認爲梁啓超的思想轉變受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因於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於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理論的影響。[44]

其三是民國初年梁啓超從擁袁到反袁的政治實踐。有學者認爲梁啓超在政治上和實踐中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一是實踐過程中不能像西方資產階級的不同派別那樣在與封建勢力的鬥爭過程中求同存異繼而輪流執政，他在幫助袁世凱擊敗國民黨的同時也瓦解了自己的政治目標。二是梁啓超擁袁的目的是最終實現改良派掌握國家爭權的願望，但卻不自覺地幫助袁世凱走上了獨裁專制之途。[45]有學者認爲，梁啓超與袁世凱的結合不是偶然的感情衝動，而是有著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礎。不過梁啓超對袁世凱不是一開始就十分相信而依附他，在建

39 劉振嵐，〈論戊戌時期梁啓超的民權民智思想〉，《北京師範學院學報》1990年第3期。
40 管彥波，〈梁啓超民權思想〉，《晉陽學刊》1992年第4期。
41 李華興，〈梁啓超與中國近代化〉，《歷史研究》1991年第3期。
42 郭馳，〈也論梁啓超的「流質易變」〉，《學術月刊》1992年第7期。
43 劉雲波，〈論梁啓超二十世紀初鼓吹革命〉，《史學月刊》1993年第2期。
44 吳春梅、方之光，〈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政治思想的演變〉，《江蘇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
45 董波，〈梁啓超與民國初年政黨政治〉，《江蘇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

政和治國等關鍵性問題上一開始就存在著分歧。一旦，梁啓超及其進步黨人失去了政治活動的立足地，便成爲第一個公開揭起反袁護國旗號的人物。[46] 也有學者認爲，「此時梁啓超是袁世凱御用的工具，還不如說梁啓超妄圖利用袁世凱作爲實現自己立憲政體的工具更確切些。這個時期的梁啓超是在爲自己、爲立憲派奮鬥，不是專意在爲袁世凱效命」，[47]「梁擁袁的前提是愛國，是爲了實現自己改良的政治目的，並不因擁袁而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48]

2．梁啓超的文化思想。梁啓超文化思想的最大特點也是「變化」，從早期托古改制的「全變」思想到中期「教無可保」的西化思想，再到晚期中西精神——物質兩分互補的文化主張。經歷了對西方文化由醉心到冷漠，對傳統文化由離異到回歸的過程，始終徘徊於感情與理智、歷史與現實的兩難之間。

有學者認爲，包括梁啓超在內的晚清士大夫向西方學習，不是對西方文化理性思考後的決定，而是爲了挽救亡國滅種的危機所採取的應急措施。[49] 有學者則認爲造成梁啓超愛國文化觀矛盾善變的主要根源是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基礎和調和主義的文化原則。他的善變是「爲國而善變」，是西學爲主抑或是復歸傳統，都是要求對中西文化進行調和。[50] 還有學者認爲，梁啓超「淬厲其所本而有新之」就是對傳統文化進行更新改造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就是吸收外來文化之長補傳統文化之短。[51] 有學者根據梁啓超的「碰撞」理論，分析了他對未來文化的設想，認爲梁啓超從東西文化各自面臨的困境出發，探索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模式，這種努力是「前驅先路」。[52]

以往有學者認爲五四新文化時期，梁啓超主張尊孔復古是其走向反革命陣營的重要標誌。近年來有學者對梁啓超思想「保守」說法進行了重新認識：「梁啓超……過去是在引進西學的過程中對儒家文化進行批判和改造，之後則公開提出以『化合』中西文化爲己任……這是他對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深入、全面客觀思考後得出的結論」，但作者也認爲梁啓超「頑固地堅持儒家文化也就必然戴上了舊時代的烙印。」[53]

有學者認爲梁在晚年對傳統文化和西學的認識比較客觀，認識到傳統文化一定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獲得新的發展，遂強調「傳統文化向現代過渡，本質上是先秦思想、佛教哲學與近代西方學術的結合」，但是「把梁視爲當代『新儒家』創始者是不正確的。」[54] 有學者認爲梁啓超晚年對傳統文化的「復歸」是一種「今勝於昔」的舉動。梁啓超早期基本上是以進化論爲圭臬，以破壞、否定爲己任來批判中國古今文化的，對本土文化的肯定是不自覺的，而現在他以建設、肯定爲己任來清理古今中西文化。他的「回復」實際上是一種翻新和進步，是新的歷史下的整合。[55]

3．梁啓超的學術建樹。梁啓超是近代中國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師，在文學、經濟、法制、新聞報刊、教育等眾多領域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成爲學者研究的新熱點。有些在過去已經爲研究者所重視並取得了不少成果的領域，又有新的突破。對梁啓超的研究甚至吸引了一些其他領域的學者，運用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對梁啓超的思想進行全方位的解讀。

梁啓超在文學方面是頗有建樹的。有學者強調指出「他所積極倡導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與『小說界革命』，事實上構成了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開

46 林家有，〈論梁啓超由擁袁到反袁思想的演變〉，《文史哲》1994 年第 4 期。
47 同上註。
48 郭劍波、曾美紅，〈略論梁啓超從擁袁到反袁的轉變〉，《浙江師大學報》2000 年第 1 期。
49 劉福祥，〈梁啓超中西文化觀的演變〉，《東嶽論叢》1990 年第 2 期。
50 關健瑛，〈試論梁啓超文化思想的內在一貫性〉，《求是學刊》1993 年第 3 期。
51 馬永山，〈梁啓超改造傳統文化的思想和實踐〉，《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1991 年第 4 期。
52 張躍先，〈梁啓超晚年的文化思想初探〉，《甘肅理論學刊》1991 年第 3 期。
53 陳國恩、朱華陽，〈陽明心學與梁啓超的文學改良觀〉，《武漢大學學報》2002 年第 6 期。
54 蔣廣學，〈論梁啓超對中國文化向現代發展的探討〉，《東方論壇》1996 年第 3 期。
55 李大華，〈梁啓超文化觀尋迹與反思〉，《江漢論壇》1994 年第 4 期。

端」。[56] 有學者以梁啓超創作的《新中國未來記》爲個案說明他倡導的「小說界革命」的重要性，「雖然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作了種種具體的預想有同現實相悖之處，但梁銳意革新，追求民族獨立，建設新文化的政治理想卻是不可抹煞的。題材選取範圍廣及全球，時間跨度爲半個世紀，故事情節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藝，在中國先前的小說裏是絕無僅有的，即使是在當時出現於東西方的政治小說也是難以比肩的。」[57] 有學者認爲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20 世紀文化啓蒙的深刻變化是由梁啓超發端，梁所論及的諸多問題，即是五四新文化時期所關注的基本命題，「和五四新文學的啓蒙性是一脈相遞嬗的」[58]。

法律方面，有學者認爲「梁啓超宣傳以西方民權學說和民主原則爲基礎的法治思想與憲政主張是中國近代法制啓蒙的重要組成部分」。[59] 但在評價梁啓超晚年對中國法制的建設時，有學者指出，「晚年梁啓超的法文化觀具有明顯的倒退傾向，這從其肯定人治而否定法治的言論中即可得到證實。」[60]

經濟方面，有學者從宏觀角度考察梁啓超對市場經濟的看法，認爲「梁啓超從本世紀初中國的現實出發，提出了在中國建立近代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即確立規範的競爭機制；培養新式企業管理人才」，梁啓超「主張通過改良的手段推動其平穩健康發展，這些觀點對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61] 也有學者從微觀角度考察梁啓超對清政府舉債問題的分析，認爲「他依據西方近代財政學原理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外債實踐，尤其是對舉借外債所需的政治條件的論述」，從而「徹底否定了清政府舉借外債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表明了與當時專職政府的外債政策勢不兩立的鮮明態度。」[62]

新聞報刊方面，學者們高度評價了梁啓超的巨大貢獻，認爲他「是以政治家身分從事報刊活動的第一人」，「真正在政壇嶄然見頭角是在主編《時務報》之後，並作了如下貢獻：主編《時務報》，推動近代第一次辦報高潮；提出『耳目喉舌』論，揭示報刊的多方面功能；創造『時務文體』，開一代文風。」[63] 有學者認爲儘管「梁的報紙思想也是爲他的政治思想服務的」，但他仍然是「中國近代新聞事業史上的一座豐碑深刻的新聞思想家，影響了後世的辦報活動」。[64] 有學者評價說「在從鴉片戰爭開始到五四運動時期完成的近代輿論轉型中，被譽爲『輿論驕子』的梁啓超起到了核心人物的作用。」[65]

城市觀念方面，有學者認爲梁在 1903 年遊美期間「敏銳地注意到西方的城市自治傳統是建立近代民主國家的基礎，而中國的自治傳統是族制自治，二者大相逕庭，中國和西方地方自治不同精神的釐清，影響了 20 世紀以來先進知識分子對城市的看法。」[66]

音樂方面，有學者指出，「梁啓超是近代最早介紹外國歌曲的人。就他在音樂思想和理論活動而言，可以說超出了同時期很多音樂家，居於獨特的重要地位；他的音樂思想、理論、意見和主張，構成了當時進步的音樂思想的主流，衝擊著封建音樂文化。」[67]

4．梁啓超與其他人物的比較。通過探討梁啓超和同時代人物的關係，有利於我們更好地解讀梁啓超。章

56 孔範今，〈梁啓超與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文史哲》2000 年第 2 期。
57 蔣英豪，〈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新舊文學的過渡〉，《南開學報》1997 年第 5 期。
58 同註 53。
59 沈大明，〈梁啓超與中國法制的現代化〉，《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2 年第 3 期。
60 王揚，〈梁啓超的法律思想與中西法律文化〉，《法商研究》1999 年第 3 期。
61 李秀芳，〈梁啓超自由主義經濟觀探析〉，《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01 年第 3 期。
62 潘國琪、朱俊瑞，〈梁啓超論舉借外債的政治前提〉，《浙江大學學報》2000 年第 1 期。
63 沈繼成，〈梁啓超與《時務報》〉，《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8 年 9 月第 5 期。
64 屈家惠，〈試論梁啓超的報紙思想〉，《四川教育學院學報》1997 年第 3 期。
65 史媛媛，〈梁啓超與中國社會輿論的近代轉型〉，《鄭州大學學報》2001 年第 1 期。
66 趙可，〈梁啓超的城市觀念初探——以〈新大陸遊記〉爲中心〉，《社會科學研究》1998 年第 5 期。
67 達威，〈梁啓超、曾志忞對近代音樂文化的貢獻〉，《人民音樂》1983 年第 2 期。

太炎與梁啓超皆爲近代思想學術界的一代宗師，有文章探究了章梁之間各個時期離合的複雜交往過程，認爲「章太炎與梁啓超關係的演變是清末民初政局和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一個縮影，是革命、改良兩個政治派別從合作、對立、再合作、再對立直至退出歷史舞臺的複雜過程的典型反應。」[68]

比較梁啓超和王國維的治學特點，看出二人在相同的時代大背景下，有相似之處，又因個人氣質取向及師者的不同，學術風貌相異。「梁啓超時刻注意古今結合，並以古鑒今，使著作呈現現代風貌，具有致用價值；而王國維有意借鑒西方理論，融會傳統，在哲學基準上創立範疇，體現了自我在歷史流程中的獨立思考。」[69]

「五四」期間，以胡適爲代表的科學實證論者，維護科學的權威，將科學方法的效用推向極致，形成唯科學主義思潮。這種「科學萬能」的論調，遭到了梁啓超以及具有相同致思趨向的人文學者的駁難。在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文化氛圍下，科學派無疑是勝利者，但從學理層上看，玄學派對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的肯定，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70]

福澤諭吉與梁啓超作爲日中兩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兩個啓蒙思想家，其思想表面上具有眾多相似之處，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福澤諭吉切斷了國家現代化和傳統文化之間的聯繫；而梁啓超接受民主思想卻未信仰自由主義，他關心的是建立團結強大的民族國家。[71]

比較研究是這個時代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比較研究法本不是一個新的史學方法，但卻在 60、70 年代「差異」史學理論的召喚下，被時代賦予了新的內涵。有關梁啓超研究的幾篇比較文章都是從思想上著手，這一方面是因爲在學術思想上做比較，更有可比度，另一方面也是因爲有關啓蒙思想、社會倫理和國民性的討論曾在學術界佔有重要的地位。

四、小結

大陸近百年來關於梁啓超的研究具有這樣一些特點：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展，原來已有較多研究的方面在理論上有新的突破，並且不斷開拓出新的領域；研究的方法逐漸增加，傳統的方法有新的運用，新的方法開始出現，比如開始較多採用與同時代同類型的歷史人物進行分析的比較研究法；研究的視角在不斷地轉移，逐漸從政治史的研究轉向社會文化史方面；新的史料不斷地被發現，既校正了一些學術觀點，更有力地推動了梁啓超的研究；研究的成果越來越多，並呈現出階段性；研究者的隊伍不斷壯大，不僅是史學工作者更多從事這一研究，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者也介入其中。儘管如此，梁啓超的研究領域仍有待進一步拓展，視角仍有待進一步轉化，方法仍有待進一步創新，史料仍有待進一步發掘，需要進一步加強和推進此項研究之處尚多。

近百年來，中國社會在不斷地發展進步，時代的話語在不斷地變換，而話語的轉變改變了人們對梁啓超研究的方向和評價，也影響了學者對這個人物所關注的程度。當「革命」話語主導於報刊文章時，梁啓超作爲反面對象不是被人們指責就是被歷史遺忘。當時代的話語由「革命」變爲「改革」時，作爲改良主義者的梁啓超的價值被人們重新發現，對這個人物的研究也就如雨後春筍般展開。有些文章先對梁啓超進行總的評價後展開論證；有些文章則對梁啓超的某一方面進行集中討論；有些文章則從新的角度察看梁啓超慣常的論述；有些文章確實填補了學術的空白。因此，隨著話語的轉變，對梁啓超的評價也逐漸地較爲客觀和科學，也使得這個人物的多樣性、複雜性慢慢呈現在人們的面前，而不僅僅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在對百年梁啓超研究的成果進行整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梁啓超研究的推進與一些學術討論會相關聯，一些比較重要的研討會可能會引發許多問題的思考，可能

68 元青，〈章太炎與梁啓超〉，《天津師大學報》1995 年第 6 期。
69 呂玉華、白振奎，〈梁啓超與王國維治學特點比較〉，《江淮論壇》2001 年第 1 期。
70 董德福，〈梁啓超與胡適關於「科學」的對話及其意義〉，《中州學刊》2001 年第 5 期。
71 鄭浩瀾，〈福澤諭吉與梁啓超國民思想之比較〉，《江西社會科學》2000 年第 5 期。

會促成對梁啓超研究的小高潮，這說明討論交流有利於促進學術的發展，尤其是在當代，學術上沒有互通有無的聯繫可能會造成較爲嚴重的學術資源浪費，一些重複的、沒有多少新意的文章和著作還會出現。但有些在討論會「催生」之下產生的文章，其學術價值也值得懷疑，不排除有些文章是爲了討論會而討論，這也是一種學術研究上的缺憾。

近百年來，梁啓超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和諸多研究成果，但是有些問題也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的。一方面我們要有好的學術批評，這是學術發展、進步的重要「武器」。儘管在梁啓超的研究中碩果累累，但也不乏學術上的浪費，也有一些空洞無物的言論。這需要引起學人們的警覺。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們也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即我們的學術批評要適當有度。畢竟對梁啓超的研究也是一個知識生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各方面條件的變化和時代的局限，人們的認識不可避免會受到影響，我們要在尊重別人知識生產的基礎上進行合情合理的批評，特別是要看到主流話語對人們學術觀點的影響是難以避免的，因此，我們在梁啓超的研究中不能爲學術批評而批評，對過去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時也不能一味指責。另一方面，梁啓超的研究在西方「年鑒學派」史觀的影響下，走向了社會真實的「細化」，在「後現代、後解構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走向強調「差異」和「顛覆」，這無疑使我們可以從多角度、多側面地來認識梁啓超，但我們在把知識細化，學問做小、做精的同時，是否應該注意到加強對梁啓超這位歷史人物整體性研究的必要性，我們懷疑一個被研究者割裂開的梁啓超「組合」之後，能否還原。

我們覺得梁啓超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他的影響所及也不僅僅是中國。因此，對梁啓超的研究我們強調注意國際化的問題。這需要我們不僅從中國的角度來探討，還要從世界的角度來認識這位跨越中西文化的近代中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這就迫切地要求大陸學者和海外的學者們聯手共同推進梁啓超的研究，無論是從搜求資料、互通學術資訊還是整合學術力量，開展專題研究來說都要如此。

我們還想提出一點建議，即如何避免學術重複性浪費和提升學術水平的問題。我們認爲解決這個問題比較有效的辦法便是在文章展開論述之前，應該進行一番學術研究回顧，這在大陸的文論中是相當缺乏的。學術回顧既是對前輩學者研究工作的尊重，也是尊重知識產權，尊重原創性的體現，還可以不斷提升研究水平，後輩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在世界領域邁向學術高峰。如果說在 1978 年以前因爲發表的文章數量較少，每有力作問世，學界即人盡皆知的說法並不誇張；但在資訊爆炸的今日，這個過程則是必須的了。

總體說來，通過對大陸近百年有關梁啓超研究的綜述，我們可以比較全面地總結涉及人物研究的史學理論、史學方法、人物評價體系、史料的解剖角度甚或人物常態研究等，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的一些脈絡。隨著新研究方法的探索與運用，有關梁啓超的研究也受到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理論及方法的影響，海內外學者對梁啓超的研究，也有一個向社會生活描述和比較差異研究的話語轉向。應該說對梁啓超的解讀是爲了更能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嬗變，筆者深切希望日後學者對梁啓超的研究能在前人的基礎上選擇更好的主題，加以突破，能在有關研究的體系中定位更準的靶的。

我們有理由相信，21 世紀對梁啓超的研究，也將進入一個嶄新的紀元，創造更令世人矚目的輝煌。